

文史哲研究丛刊

词体诗化、曲化的 批评解读与词史进程

李冬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词体诗化、曲化的 批评解读与词史进程

李冬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体诗化曲化的批评解读与词史进程 / 李冬红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8291-4

I. ①词… II. ①李… III. ①诗词研究—中国②散曲
—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4301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词体诗化曲化的批评解读与词史进程

李冬红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8291-4

I · 3121 定价：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此书为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51035),此书获得曲阜师范大学古代
文学重点强化建设学科的资助。

前　　言

词与诗、曲一样皆为韵文文学样式,都具有抒情言志的文学功能和多样的风格类型,但又各自形成独特的文体特性。同样的题材用诗、词、曲分别表达,便会呈现出不同的韵致,散发出相异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一种文体习用的语言样式、表现手法、风格类型等有直接关系,也正体现出文体所具的独特性。每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而在一种文体发展演变的前期或末期,即处于尚不成熟或已然衰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认知,或尚在模糊探索过程中,或试图以他体加以改造以挽救颓势,此时期最容易受他体的渗透或影响。

即如词体而言,唐五代北宋初期,词处在一种承袭前体、试立体制的阶段。文人们普遍认定其娱人遣兴的艳科俗体特质,属小道末技,对之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和贬斥,并未视之为一独立文体。然而,带着与生俱来的好奇追新心态,他们一方面用自己最为熟悉擅长的传统诗歌技法模仿新兴世俗之词,另一方面又尝试着运用不同于诗体的语言风格来表达情感、进行娱乐,于是文坛上呈现出诗词一体化的创作态势,然诗词二者的分界线已逐渐明晰,词体舞台也开始慢慢拉开序幕,诗词分界线已初步划定。

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文人大量进入词体创作队伍行列,词体雅化程度日益加深,传统的诗歌题材、成熟的诗歌语言和规范的诗歌表达方式等都习惯性地介入词体,所谓“以诗为词”的现象层出不

穷，并日渐突出。随着词体的趋于成熟和人们对词体认知的逐步全面，词体亦开始排斥他体的渗透，努力呈现出自己的个性特点，从而达到了它的发展高峰时期。与此同时，词体也对传统诗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故出现了诸如秦观的“诗如小词”的现象。

元朝建立，随着新兴诗体——散曲的出现和兴盛，词又开始受到曲体的冲击，当然这与词、曲更为相近的共通的音乐属性有密切的关系，文坛又产生了词体曲化的现象。明代，词已成为纯案头文学，又居于发展繁盛的曲体阴影之下，呈现出衰退之势。与之相对，经过长期积累沉淀、定型成熟后的散曲，不可避免地将其某些文体属性向词体转移，于是出现众多词体曲化现象。随着清朝盛世的出现及朴学的兴起，文人内心固有的诗教精神、雅俗之辨及文体尊卑观念，牵引着他们对元明词的曲化现象做出否定批判的判断，并全面加以反思，重新定位词体，以尊体的面目将词从曲体中拉回到诗歌轨道，带来了清词的中兴局面。

由此可见，词体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正是由于它既与诗、曲有着不同的个性特质，又存在天然的联系，是一母同胞，故它在与二者保持距离、固守个性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与二者发生着联系，词正是在诗和曲二者的挤压和融通中发展演变的。从诗、词、曲共生互摄及排挤背离的文体关系的角度来认知词体发展历史，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亦是一个更接近于词体发展真实状态的视角，可有助于深化对词体的认识，有益于辨析词学理论，从而更加全面而准确地观察和了解词体发展史。

回顾百余年来的词学研究，在诗、词、曲的关系问题及词史构建方面上出现了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词与诗、曲的文体辨析。诗、词、曲同属韵文，又自具面目，凡涉及三者研究的论著与文章多少都会谈到三种文体的异同，如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王易《词曲史》、赵山林《诗词曲艺术论》、缪钺《诗词散论》、赵义山《元散曲通论》及大量的学术论文，皆

有对三者之文体特征的探析。这些研究大多着重于从文体的外在样式及读者的主观感悟方面分论三者之差异,往往聚焦于三者的辨析上,对它们之间的交融互通多只是简略言及,先后延承,如音乐性、抒情性等,缺乏深入探讨,长期以来形成一些较为统一且基本定式的观点。

二、“以诗为词”与“词之曲化”的内涵与价值探寻。古今论者从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出发,对“以诗为词”和“词体曲化”的理解和判断颇为复杂,既有对这一词学命题的肯定,也有对它们的否认,虽各有可取之处,却导致二者的内涵至今模糊不清。

就“以诗为词”而言,学界多认为是创作者将诗歌的语言字句及表现方式带入词体,如崔海正先生认为诗人句法是“以诗为词”的核心,但不宜以此一概念去涵盖东坡词的基本特色^①,刘石先生则认为“以诗为词”多是将诗词字句在作品中的借用和相似性作为判断标准,此种判断具有过强的主观兴感的倾向,故而质疑了“以诗为词”的存在价值和命题意义^②。对“词之曲化”问题,一般认为是词的散曲或剧曲化,或者说是人们用曲的概念、风格、语言亦或综合因素加入到词体创作中,从而形成的词体在文体特征上向曲的偏移。如洪静云先生认为曲化即以曲的声情填词^③,胡元翎先生言曲化是词的音乐文学化,非单纯的曲体因素入词等^④。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将“以诗为词”和“词体曲化”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如诸葛忆兵先生提出要辨明“以诗为词”的含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诗词之辨的实质在于教化与娱

^① 崔海正《东坡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② 刘石《试论“以诗为词”的判断标准》,《词学》第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33页。

^③ 洪静云《明词曲化现象述评》,《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④ 胡元翎《“词之曲化”辨》,《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乐^①。彭玉平先生认为“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应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其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才可以得到准确阐释^②。胡元翎、杨钊二位先生等则从杨慎等具体词人的作品中对“词之曲化”进行分析^③。可谓角度各异,观点众多,争议颇大。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学者们对二者之价值进行了探讨,并普遍认定:“以诗为词”是词体开拓题材、提升文体的主要途径,虽一定程度上损害词体的本体特征,总体持肯定态度;“词体曲化”是元明词衰落的最重要因素,或是明词变革的一种尝试等。然而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入更大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去审视,词之诗化与曲化其实有多重内涵。上述种种论述稍显平面简单化,未能真正探寻到词与诗、曲互动的深层内涵,也就不能准确地认知它们在词体发展进程中的存在价值与词学意义。

三、词史构建一直是词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众多词史著作应运而生,如刘毓盘《词史》、王易《词曲史》、杨海明《唐宋词史》、陶然《金元词通论》、张仲谋《明词史》、严迪昌《清词史》、刘扬忠《唐宋流派史》等,既有通代词史,亦有断代词史,从近代学者对词史的简单描述到现当代研究者对词体发展脉络的全方位建构,越发清晰地呈现出词体的发展进程。综观诸多词史专著,大多是以时间为线索,按照词人的时代先后、性行里居的考订、梳理和叙述,观察角度与构建方式较为单一,从而使得词史发展进程的展现过于平面化和模式化。

四、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转换视角,从诗词互动的角度考察词

^① 范文《“以诗为词”辨》,《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彭玉平《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③ 胡元翎、张笑雷《论杨慎词曲的互融互异兼及明词曲化的研究理路》,《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杨钊《杨慎“以曲入词”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

体发展进程,如王兆鹏先生以唐宋时期不同时段诗词离合的状态差异展示词体的变化进程^①,之后李定广先生把王文中未能完全展开论述的唐五代诗词关系所带来的词体进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两篇文章以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演绎了唐宋诗词离合的基本规律,无疑具有学术开拓和导向的意义。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则以大文学史观的学术理念与多元开放的研究视角,在历史文化参照体系的介入中,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二律制约的驱动中,演绎诗词互动的词体运行轨迹。他们都认识到词体演进过程中诗体参与的重要作用,以期寻求词史发展进程中的诗学因素,建构诗词同构的词史框架。

总之,诗、词、曲文体互融现象的讨论已成现今学界的常谈话题,但论析较为混乱,又常人云亦云、惯性因袭,观点稍显片面和守旧,又多聚焦于苏轼与杨慎等少数文人,且研究视角与论述方式呈现重复倾向,内涵的探讨较为笼统宏观,缺乏对词体某一特定发展时段的具体考察与不同时段的差异比较。与此同时,在对诗、词、曲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是将之做为单纯独立的研究对象,未将它们融入词学与词史研究中,或仅仅局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阶段,未能从整个词史的发展角度去发掘词之诗化与曲化的价值与意义,形成研究视野的狭窄与观念的陈旧,尚无从宏观领域对词之诗化、曲化现象与整个词史进程和词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如上所述,词与诗、曲的互动问题已开始进入人们认知词体发展史的视野,但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尚无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成果。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运用跨学科、文体学和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词体为研究中心,解读词之诗化和曲化的内涵,围绕词与诗、曲的离合关系展现词体的发展历程,分析词之诗化与曲化的

^① 《从诗词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 《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创作现象以及引发的批评话语,探寻创作与评价背后的深层原因,讨论这些创作方式和理论观点在词史与词学的价值与意义,进而探讨文学发展进程中文体互动的一般规律。

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词之诗化与曲化的内涵辨析。无论是词的诗化和曲化,亦或是诗和曲的词化,都是在词学史上引起相当争论的话题,反映的是在不同词学观指导下所作的或褒或贬的价值评论。然而,这些命题不是单纯用文体因素就能阐释清楚的,其理论内涵、适用对象、判断标准等都还缺少较为耐心与细致的寻绎。对一个理论命题本身而言,准确合理的解读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恰当地运用它们去进行有效的文学研究活动的必要前提。故这一部分旨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发展时段、存在语境、文体要素等多方面因素,力图真实而全面地审视并探析词体的诗化与曲化的根本内涵。其实,无论对“以诗为词”还是“词体曲化”的内涵辨析,都应以诗、词、曲不同文体的差异性为前提,结合彼此之间的渗透与融通,并最终落实到词体在韵致格调及整体风格上的变化。

二、诗、曲参与的词史进程的梳理。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唐宋以来词体创作的全力搜集和整理,找寻并着力突出其中所存在的大量诗化或曲化的具体作品,结合作者的创作思想与写作方式,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认真的比对,以期展现诗、曲在词体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故这一部分遵循总体概述与个案研究并行的论述原则,力求全面化呈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词体与诗、曲离合的创作方式和表现形态,以此角度展示词史进程,说明词体是在诗和曲二者的挤压和融通中发展演变的。在这一由诗与曲共同参与的词史中,词体充分显现出其强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文体色彩。

三、词之诗化与曲化的成因与词史意义的探寻。如上一部分所述,整个词史正是在诗化与曲化等文体相参互融的内外推进力的作用下逐渐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词体的发展演变并不

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更关涉到它与诗、曲的密切而微妙的文体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词体的诗化与曲化现象,关系到时代氛围、文坛风气、作者身份、创作惯性、文体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更是词体与生俱来的诗性与曲性内质所决定的。

从文体角度而言,词是对近体诗的进一步的音乐化与格律化,决定了词最终成为更注重声律的别样诗体,具有文人诗歌所固有的传统雅文化基因,而词体初起时歌唱表演的性质和娱宾遣兴的功能,使词同时带有曲体俗文学的基本质素,这种种基因必定会随着时代文坛的风云际会被人适时地挖掘出来,或淡化退缩,或膨胀凸显,或两相平衡,呈现出诗化与曲化的不同色彩,这实际上也是词体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对更为适合本体发展路径的主动寻求。

词体诗化或曲化的做法有意无意消弭了前人经年摸索而后形成的词体独具的特性,打破了词与诗、曲之间的畛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词体的文体特性,消解了词体的独立性,从本质上而言是对词体的不公,不利于词体的发展,不应把它们作为一种常规创作方式加以提倡。但词体同所有文学体裁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内容题材的扩大、艺术表现手法的成熟、表现功能的增强等,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不仅作品风格因人而异,姿态纷呈,即便是同一个词人的作品也会呈现不同的格调与韵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风格类型。这本是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常态,只要立足于词体的特质,基于力主文体独立、提倡文体特性的立场,对诗、曲的借鉴和应用,不超越一定的限度,不破坏或丢失词体的文体特质,无论是“以诗为词”还是“词体曲化”,都不能否定它们在丰富词体文学上的贡献,必须承认它们在词史上的存在价值。

四、词之诗化与曲化创作现象的批评解读。唐宋时普遍存在的诗词相通的现象,令人们在诗词辨体时十分纠结。经过元曲冲击后的明代词学,又强化了词曲关系的探讨。于是,如何定义词之

“上不似诗，下不似曲”的尴尬地位，成为清代词学反思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辨体基础上，历代学者针对以“词之诗化与曲化”为核心的破体问题做出了或融通或矛盾的评价。

通览词史发展过程，在诗词关系中，词更多倾向于诗，如“以诗为词”，这种创作方式易为文人接受并获得较多肯定，认为词的诗化增加了词的表现功能，是对词格的提升，亦被看作尊体的表现；词曲关系中，词更多倾向于曲，如词的曲化，常遭致人们的质疑和批评，被认为是词体不尊进而衰亡的重要原因，成为时人乃至后人诟病词作的常用话语。人们努力对之加以改造，最终将词引进雅文化的中心领域，把词重新拉回传统诗教的轨道上。总体而言，诗化常与雅化相伴，向主流文化靠拢，多获得人们的肯定；曲化则与俗化相称，偏离儒教传统，为词学家所否定。词体的诗化与曲化两种创作现象所招致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体观念的影响，在一般文人眼里，诗为上、词次之、曲再次的价值定位顺序是不可撼动的。

词居雅诗与俗曲之间，本应努力追诗，尽量避曲，但实际上在词史发展进程中，词既有诗化倾向，又现曲化趋势，说明词体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在与诗、曲的互动中并未完全符合古代文体互参的一般美学原则，即地位较高之文体可渗入低位之文体，而低位之文体则不可上缘高位之文体。词体这种复杂的文体地位变化和曲线的整体运行走势，不仅关涉到文体的表现内容、功能作用、审美理想等内在因素，与文体的发展阶段、所处语境、文学观念的变化等外部环境亦有直接关系，带给批评家们诸多困惑与思考，同时也形成了批评走势的多向性。由此引发的丰富的词学批评理论，不仅关系到词学尊体、正变、雅俗等核心问题，而且涉及一个文学理论命题，那就是文体互动过程中的规律遵循与适时背反。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较为复杂，在学界中存在过多的分歧和模糊之处，涉及多种文体和政治、哲学、文化、文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融会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如何将表层现象与内涵实质、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辨进行潜层发掘和深度对接,得出既合乎实际又令人信服的论断,是研究过程中的最难解决的问题点,亦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而对词之诗化与曲化创作现象的展示与内涵辨析则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由文体互动的角度重新认知词体的发展进程是重点阐释之处。

要实现上述研究目标,必须将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做为依据和前提,熟悉唐宋以来的诗、词、曲作品,尤其是代表作家的作品,并从中解读出具有三者融合现象的作品,通过认真细致的分辨与解析,寻绎整理历代对文体互动现象的评价。同时,由于诗、词、曲三者的互摄现象的内涵丰富复杂,分歧众多,辨析时既要有宏观概括,又要按照词史的演变轨迹做到具体细致,力图得出与文体发展相印合的清晰明了的独立观念。在创作评析与内涵辨析的基础上,始终抓住诗、词、曲三者的互动线索,并适时融入历代词家批评,努力从词与诗、曲的离合中展示词体的演变进程。故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和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实证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总体架构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由于本文以词体为研究中心对象,故主要探讨诗与曲对词体发展的影响,分析词的诗化和曲化问题,至于诗、曲的词化现象将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加以补充研究。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内涵辨析	001
第一节 词的文体辨析	003
第二节 “以诗为词”的内涵辨析	020
第三节 词体曲化的内涵与界定	045
结语	055
第二章 诗化与曲化中的词史进程	058
第一节 诗、词一体化的唐五代词	061
第二节 诗、词分合中的宋词	080
第三节 诗、曲夹缝中的元词	106
第四节 词、曲离合中的明词	117
第五节 诗、词合一的清词	127
结语	143
第三章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成因及创作得失	146
第一节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成因	148

第二节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创作得失	181
结语	189
第四章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批评解读	192
第一节 词体诗化的批评解读	192
第二节 词体曲化的批评解读	218
第三节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批评走向解析	234
第四节 清代词学“尊体”辨	245
结语	256
主要参考书目	259
后记	263

第一章 词体诗化与曲化的内涵辨析

文体风格论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人们常把一种文体的主要艺术风格以“体”“体制”“大要”“势”等范畴进行说明。文体风格是指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经过文人们的实践摸索后逐渐形成,并定型下来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是一种文学样式经过历史积累和沉淀后最终形成的、具有共性的、为多数人所认同的艺术倾向,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和审美传统。大体而言,文体风格的形成和文体的外部形式、社会功能、表现对象、特定的表达方式等因素都有关系。从古至今,每一种文学体裁都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和独有的风格。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时,往往会先考虑体制问题,即文体风格,只有把握住文学样式的体性特质,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而一种文学体裁的文体风格,只有在与他种体裁的具体参照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三种代表形式的诗、词、曲,历来备受学者重视。尽管兴起之初它们都同属合乐歌辞,但成熟定型后各具特色,并由此出现分疆划界的现象,产生众多实际创作和理论批评问题。主张严守诗、词、曲畛域的,自唐以降,代有其人。盛唐时代,诗歌经过历代诗人的不断探索,体制日益完备,技巧渐趋成熟,蔚为一代之文学,而词体始告确立,唐末的温庭筠开始彰显诗、词之别,词与诗遂呈平行交叉态势进展,却始终被视为诗余和小道。北宋中期,苏轼以诗为词,突破花间藩篱,打破

诗、词界域，引起众多时人学者的热烈争论。陈师道《后山诗话》讥之曰：“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①，胡寅、胡仔、王灼等人却对苏轼新词风加以褒扬，称“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②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对宋以后的诗词创作和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并随着人们对词体认识的深化，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融合趋势。

元代文坛上除了传统的诗、词外，又有了散曲的加盟，并以其新兴文体的强大生命力向诗、词发起冲击，诗、词、曲在韵文领域鼎足而三，词之诗化与曲化问题同时出现于文坛，引发众多争议。至明代，词体曲化成为词坛上重要的创作现象，亦成为后世对明词特点的定位和贬责的主要原因，往往被看作词体衰亡的重要因素。清人由此展开对明词的痛斥与反思，带来词体创作与词学批评的再度繁盛。人们对诗、词、曲三者的体性之别，进行了诸多讨论。如李渔言：“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并从腔调即风格上作了区别，“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③近人吴梅、宛敏灏、任二北等先生于此亦有经典论述^④。

无可置疑，诗、词、曲的文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人们热衷于对三者进行文体辨析的重要原因。然而，不同文学艺术的发展除了纵向的历史继承，还有横向的交融与吸收，即如诗、词、曲而言，它们在抒写题材、表现手法、语言情调和艺术规范诸方面表现

^① 李清照《词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

^② 胡寅《酒边词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本文凡引该书者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③ 李渔《窥词管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549页。本文凡引该书者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④ 参见吴梅《词学通论》、宛敏灏《词学概论》、任二北《散曲概论》等。